

壹、前言

在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中，不論量化研究或質性研究，都要求蒐集的資料具有所謂的「效度」。而效度就是指概念（或建構）與蒐集到的資料「名實相符」的程度，若想研究學生的自我概念，卻測量或蒐集學生偏差行為的資料，「名實不相符」，即使測量沒有誤差，也沒有效度。這種研究法最基本的概念，應該是人人皆知且不會違反的原則，但是，在學生文化的研究中卻發現，某些研究運用抗拒（resistance）概念時，犯了「名實不相符」的錯誤，將「拒絕」（rejection）或「偏差」（deviance）當成抗拒，或執著於特定層面的抗拒，使質性的描述不夠厚實（thick）與完整（holistic），使抗拒概念徒具政治的「浪漫」色彩，降低理論分析的效力，殊為可惜（Brown, 1996; Giroux, 1983; Ortner, 1995）。本研究擬為抗拒概念「正名」，首先簡述抗拒的理論背景，其次澄清抗拒與拒絕、偏差之不同，進而說明抗拒的意義，最後以作者最近進行的研究為例，延伸討論進行學生文化研究的理論效度。全文從質性研究的立場，分析在進行學生文化研究時，應如何確認學生的想法與行為屬於抗拒、如何進行理論與資料的辯證、宜蒐集哪些資料、考量哪些議題、避免哪些問題。由於以研究方法的討論為焦點，因此行文時，以 Ogbu（1974）與 Willis（1977）的研究為例進行說明。這兩個研究，在質性研究的方法上有其獨到之處，並分別代表教育社會學與教育人類學兩個領域，對之後的學者具有相當示範性的影響。

貳、理論背景：從再製到抗拒

過去，在功能論的影響下，學校教育被視為傳遞社會整體文化與協助學生社會化的重要機制，並能促進社會文化的變遷。然而，自 1970 年代以降，學校教育被視為維持社會現狀與社會文化再製的機構。Bowles 與 Gintis（1976）之《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》（*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*）認為，學校教育與階級結構相互符應（correspondence），透過 IQ 測驗與能力分班，將不同階級

的學生分配到不同能力層次的班級，接受不同類型的教育，其中，勞工階級的學生接受馴化的教育，最終成為認真、勤勞、守規矩的勞工，為資產階級服務。Bourdieu 與 Passeron（1977）提出文化再製理論，認為優勢階級背景的學生，在家庭長期培養下，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本（cultural capital），並顯現於生活品味與優雅儀態，在學校受到老師的認可與讚揚，使其成績表現比較優異，升學與就業機會也較佳。而其他階級背景的學生，在家庭社會化的過程中，並未獲得這些文化資本，不但學校表現不佳，升學與就業機會也較差。

這類再製理論迥異於功能論觀點，質疑學校扮演的功能性角色，認定學校只能維持社會不平等，最終形成結構的再製。學校固然獲得掌聲與迴響，也招致批評。主要的批評是，教育系統全然符應階級結構的需求，勞工階級學生全然受到社會結構限制與形塑，階級結構亦無轉化的可能。

幾乎與上述理論同時，Willis（1977）出版《學習成為勞工》（*Learning to Labor*），扭轉再製理論忽略社會轉化可能性的問題。他描述勞工階級的男生在學校的動態過程，強調勞工階級學生的能動性。這些被稱為 lads 的男生，鄙視乖乖牌的學生，經常蹺課、搞笑、打架，顯現許多拒絕遵守校規的行為。而這些表面的拒絕行為，源自勞工階級的文化理念。lads 認為，學校傳授抽象知識，對未來工作毫無用處，社區工廠文化強調體力與實務經驗才有價值。他們拒絕學校主流文化，看似戰勝老師與乖乖牌的學生，最終仍選擇勞工階級的工作，成為新一代勞工。雖然最後的結果仍是階級結構的再製，卻是勞工階級學生自己理性的選擇，展現主體詮釋的能動性，與前述之再製理論截然不同。lads 不見容於學校的日常行為被認定為「抗拒」，並以此開展抗拒理論，做為轉化結構的基礎。以抗拒理論為基礎的批判教育能否成為轉化結構的機制，固然見仁見智，但抗拒理論引領某種學術研究的潮流卻是事實。若這些研究因為忽略對抗拒概念的深入認識，恐怕會導致錯誤的結論。標榜抗拒的研究者在研究現場發現學生蹺課、搞笑、打架等日常作為全都是抗拒行為嗎？抑或可以用其他概念，如偏差行為來解釋？